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十九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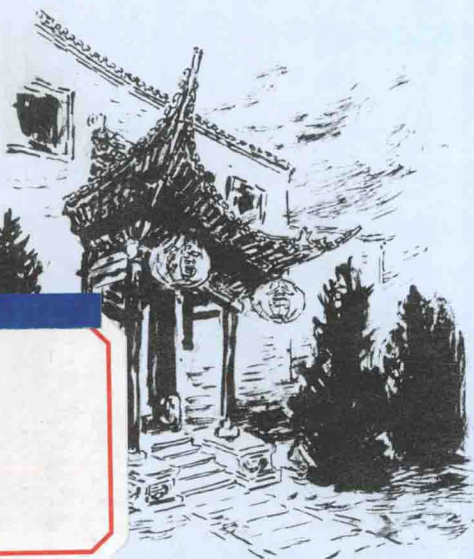
总主编 / 李玉明

山西会馆历史文化

郝田鹤
孙锁福
著

山西会馆是山西商人和商业、金融业资本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晋商发展势头正旺的时期，山西商人上通朝廷，下结官绅，北上南下，西进东出，商路辐射万里之遥，款项可“汇通天下”，曾一度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辉煌的山西会馆是山西商人为子孙后代留下的又一独特的人文景观，也是晋商文化浓墨重彩的一个缩影。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 编：刘冬梅
张 熔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董高怀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19辑)

山西会馆历史文化

郝田鹞 孙锁福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 字数：300千字

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900434-00-3

G·50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壁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李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录

引 子	(1)
一、会馆的创建与商业功能	(4)
二、会馆的文化内涵与拓展	(12)
三、会馆戏楼与山西戏剧	(24)
四、会馆的关羽崇拜与经营理念	(42)
五、历史辉煌的反思	(45)
附：现已收集的部分山西(晋商)会馆 名称目录	(49)

引 子

这些年来，“晋商”一词频繁出现，借助海内外的各种传媒，晋商的形象，现在已经成为了山西历史文化的符号之一。

晋商在近代商业上创造的奇迹和辉煌从深宅大院里走出来，逐渐为现代人所认识，所关注。于是，到山西必看晋商大院成为一种时尚。祁县的乔家大院、渠家大院，太谷县的曹家大院、孔家宅院，灵石县的王家大院，榆次区的常家庄园等等，陡然成为了旅游热点。

历史事实说明，在中国历史上明清两代，山西这个地方，曾经有一批十分成功的商人。由于他们的独树一帜，其成就甚至突破了商业的范畴，在政治、文化领域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后，山西商人有了一个响亮而且统一的称呼——晋商。

但不知你是否留意过，晋商不仅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修建有华美的宅院，而且在全国各地也留下了许多精美的建筑。这些建筑，便是诸多的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山西会馆。

山西会馆是山西商人和商业、金融业资本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晋商发展势头正旺的时期，山西商人上通朝廷，下结官绅，北上南下，西进东出，商路辐射万里之遥。款项可“汇通天下”，曾一度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

山西会馆和晋商大院一样，生于此长于彼，同是山西商

人的两个孩子，一个守内，一个主外，彼此遥相呼应；这边牵头，那边放飞，跨地域，走南北，驰骋商海，最终凸显了事业的辉煌。

辉煌中的山西会馆，是山西商人为后人子孙留下的又一独特的人文景观，也是晋商文化浓墨重笔的一个缩影。

已经为世人熟悉的晋商大院，大都是它们的主人在明代及清康熙、乾隆年间，在外经商发迹后开始修建的，有的修建期甚至经历了几十年、上百年的漫长岁月。

随着晋商的发展而修建起来的大小众多的晋商会馆，是山西商人在外生意兴盛的具体写照。可以说，斧凿叮当的山西会馆的修建史，就是一部山西商人从含辛茹苦创业到驰骋九州方圆的发展史。

从这些向后人述说昔日辉煌的一座又一座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山西会馆和古戏楼以及残存的碑碣中，都不难看出山西商人博大的经营胸怀、经营魄力、经营胆识和高明经营策略，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商业制度、商业道德、商会组织等商业文化。晋商会馆的宏大建筑规模，犹如一件件硕大无比的雕塑，清晰地传递出明清时期的会馆建筑艺术特点，蕴含有会馆的管理制度、戏曲艺术、民俗信仰等等文化信息。

山西的晋商会馆有的以高超绝伦的建筑艺术，成为当地的重要景观或文物保护单位；有的仅留下了一些断碑残铭；有的则早已毁圮而踪迹难觅。但与其他各地商人留存下来的会馆相比，山西会馆的遗存不仅为数可观，而且在规模上也是首屈一指。北京现存晋商平阳会馆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余秋雨所著《抱愧山西》一文说：“苏州有一个规模不

小的‘中国戏曲博物馆’，我多次陪外国艺术家去参观，几乎每次都让客人们惊叹不已。尤其是那个精妙绝伦的戏台和演出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但整个博物馆的原址却是‘三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做生意时的一个聚会场所。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要找一个南方戏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为文物永久保存，找来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个临时俱乐部里找到了。”由此可见，“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在今天看起来较发达的城市，在当时的城市里都有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可曾想到他们的最高总部却都设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

中国近代民国年间最为著名的“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就出生在太谷县。正是得益于太谷这块土地上厚重的商业文化熏陶，才使得孔祥熙从一介平民因商而富、而政、而显赫一时，平步青云。蒋介石评价说：“世界上最会理财的人是爱尔兰人，山西人就是中国的爱尔兰人。”

惊叹之余，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山西商人的富有，富有而富甲一方。

有关史料考证显示，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金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每次全国性募捐，捐出银两数最大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国排出最富有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业回

乡的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那么,有钱的山西商人在全国究竟建立了多少会馆?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现知的山西会馆数量尚多达几百处,地址广被海内外16大城市。仅以北京为例,因北京是明清两代的都城,也是晋商汇聚的地方,北京一地的山西会馆最多,约有40多处,或者还不止这个数字。

据粗略统计,所涉及的省市有:河北;天津;山东聊城、东阿、济南;江苏上海、扬州、南京、苏州、盛泽大馆圩、盛泽西杨圩、镇江;湖北汉口、鍾祥、当阳、郟西、随州、江陵、公安、沙市;浙江杭州;河南浙川、舜阳、洛阳、开封、赊旗;广东广州、佛山;湖南长沙、湘潭;广西南宁;青海西宁;新疆巴里坤;安徽芜湖、涡阳;吉林;沈阳;四川成都、重庆、灌县;福建福州;甘肃武威张掖;内蒙多伦诺尔等。

让我们搜寻一遍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山西会馆,认知一下山西商人昔日的繁华和富有,品味一番晋商文化异地影响和传播的精彩魅力。

一、会馆的创建与商业功能

作为中国商业史上一道壮丽的风景钱,山西会馆从明至清由小到大、由少及多、由兴而盛,几乎遍布全国各省、商埠,具有连锁感应特征。

明清是中国历史上政治与社会较为稳定的时期。在明进入清的两三百年里,商人的活动基本上是循着传统格局

向前发展的。商人在这种格局中，社会地位低下。就会馆的兴建而言，据有关专家考证，它最初出现在明代建都北京之后。会馆最初功能，主要是为各地在京的官绅提供一个聚会的场所，为进京赶考的试子提供一个暂居之地，有人把这称之为“官绅会馆”或“科举会馆”。而排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尾的商人，在这些会馆是不得入住的。

囊丰篋盈的商人们远远不满足于四等公民的角色，于是他们效仿“官绅会馆”和“科举会馆”这一组织形式，纷纷开始建立自己的会馆。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会馆的置建不仅仅局限在京城里，更是在全国各地的商业都市和城镇兴建。于是，专门服务于商业的会馆，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海内最富”、踪迹无处不到的山西商人的会馆，至清代，几乎遍布全国各省、商埠。

如果说当初官绅会馆的肇始，是显示着同乡的利益和权势的话，那么商业会馆的建立，则是为了增强同乡的凝聚力，表达商人们实行自我协调和管理的要求。同籍的商人们在异地经商，势必要沟通商情、联络乡谊、聚会议事，宴客娱乐，会馆则为他们提供了极好的场所。

我们知道，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下不允许有任何政治派别存在。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界往来竞争日趋激烈。商人与商人之间，商帮与商帮之间，“操货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基于此，旅外同乡深刻认识到：“无论日识新知，莫不休戚与共，痛痒相关”，故必须团结同乡仕商，“广其业于朝市间”。

因此，无论是从联络感情出发，还是从经商需要出发，他们都需要一种组织形式来加以联结，同乡商人“无一区托足，则期群涣”，群涣必然削弱竞争力量。而以地域为基础建立的山西会馆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社会组织形式。

山西商人善于充分利用会馆这一合法形式，将传统的地域观念及商埠中同乡人之间具有的血脉相通的手足之情自然联合起来，相互支持，共同与异域商帮进行竞争，同时又能联合抵制官府的肆意压榨。例如嘉庆十九年（1814）洛阳税收部门提高对潞泽绸布商人税收，引起晋商不满。潞泽会馆以商团名义告至官府，历时一年，几经周折，终于胜诉，减免了税收。此事使晋商在洛阳声势大振，买卖倍加红火，逐渐左右了洛阳商业市场。

而且，晋商长途贩运，分布于全国各大商埠。他们在异地他乡人地两生，难免有思亲怀旧之感。而会馆之设，皆同乡之聚，熟悉的语言、风俗，趋近的心理、文化，使他们能畅然释怀，如归故里。“四海之内，以义相投，皆为兄弟。”

何况，会馆作为重要的经商阵地，“叙语之地，正可坐论一堂，以谋商业之公益”。凡“通商之事，咸于会馆中是议”。大家定期在一起“公定时价，毋许私加私扣，……议定条规，籍以约束”；启发智识，以开通商智；研究商学，调查商情；集思广益，沟通信息。如北京的山西票号在章程中阐述并规定：“一人智慧无多，纵能争利亦无几何，必务其大者而为之。若能时相聚议，各抒所见，必能得巧机关，以获厚利。即或一个力所不及，彼此信义相孚，不难通力合作，以收集思广益之效。兹定于每月初一、十五两日为大会之期，准于上

午十一钟聚会，下午一钟散会，同业各家执事齐集到会，或有益于商日商务者，或有病于商务者，即可公平定义。如同业中有重要事宜，尽可由该号将情告之商会董事，派发传单随时定期集议”。

还有，山西在外经商人数多、规模大、时间长，仅祁县就有一半人家子弟步入贸易之途。昔日晋商在交通落后、邮递不便、自然环境恶劣的条件下，闯荡全国以至欧洲、东南亚、东北亚。他们义无反顾地出发，并不一定能到达预想的彼岸，一个成功者背后隐藏着无数的失败者，以至终生异域客死他乡者甚多。而会馆则会在第一时间伸出“相顾而相恤”之手，提供钱财、药物。对年老失去工作能力者则更要予以救济，对客死者妥善安葬等等。

如此而来，山西会馆作为一种商业组织，广置楼阁、多盖屋舍的目的，很大程度就是为同乡、仕绅、商旅驻足和贮存货物提供方便。文献称“查商贾捐资，建设会馆，所以便往还而通贸易。或货存于斯，或客栖于斯，诚为集商经营交易时不可缺少之所”。“凡弹冠捧檄，贸迁有无而来者，类皆设会馆，以为停驂地”，从而使“士、商之游处四方者，道路无燥湿之虞，行李有聚处之乐”。

俗话说：商场如战场，商海扬帆又谈何容易！可以说会馆的设立犹如在起伏波涛的商海里建起的小岛，是避风港，又是栖息地，但更像是藏了许多经商诀窍和门道宝库。

会馆，无疑给在外经商的掌柜伙计们提供了坐而论道共谋商机的场所，提供了乡音交流共叙温暖如家的场所。并以此为核心志同道合、重信守约、优势互补、配合默契。

位于北京宣武区鹁儿胡同的山西浮山会馆，有碑石记载云：

我浮山会馆建自雍正七年，其馆北位五圣像，神德灵应，佑我商人；南建演乐亭，依永和声，仰答神庥。我乡贸易诸公，每遇朔望，咸集于此，敬修祀神。虽异地宛若同乡，皆得以敦亲睦之谊，叙桑梓之乐矣。

这就极其简洁地说明了会馆的“祀神、合乐、议事、互助”的功能。

据《藤荫杂记》卷六《东城》载：“尚书贾公，治第崇文门外东偏，作客舍以馆曲沃之人，回乔山书院，又割宅南为三晋会馆，且先于都第有燕劳之馆，慈仁寺有饯别之亭。”此贾公为贾仁元，字西池，山西万泉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曾任兵部左侍郎，协理京营戎政，克经筵官。贾氏任京官时宅第在崇文门外，曾辟宅南为三晋会馆。当时的会馆规模较小，其功能主要是在京的晋籍士人聚会场所。

明代实施开中法以来，晋商以“极临边境”地理优势，捷足先登，渐成为明代最有势力的商人群体。京师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晋商为活动方便首设会馆于京师。《晋冀会馆碑记》记述：“历来服官者、贸易者、往来奔走者不知凡几，而会馆之设，顾独缺焉。……虽向来积有公会，而祀神究无专祠，且朔望吉旦群聚类处，不可无以联其情而冷其意也。议于布巷之东蒋家胡同，购得房院一所，悉毁而更新之，以为邑人会馆”。

山西商人在异地建立会馆，最早年代，约明中后期。山

西平遥颜料商建立的颜料会馆，清乾隆六年《建修戏台罩棚碑记》称“我行先辈，立业都门，崇祀梅、葛二仙翁，香火攸长，自明代以至国朝百有余年矣”。按清乾隆六年(1741)上溯百有余年，当为明代天启初年(1621)。又《临襄馆山右馆财神庵三公地重修建筑落成记碑》载：“吾乡自前明，即有山右会馆。”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重修临汾东馆记》载：“临汾为山右平阳首邑，其立馆于京师也，自前明始”。可见，晋商至迟在明代中后期已在北京设立会馆了。后来的会馆越修越好，愈建愈趋奢华，这与商人们的竞相攀比、铺张炫异心理有关，实际上也在为自己的商帮作广告。

山西商人除北京之外，先后在国内城镇各商埠设立了山西会馆。东起江浙，西至新疆，北自奉天(辽宁)，南到两广，就别说地处中原的河南、山东、河北各省和繁华商埠的汉口、苏州、杭州、扬州了。可以说，凡是商贸繁华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凡是山西商人聚集的地方就有山西会馆。正所谓“只要有麻雀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以河南南阳赊旗镇《山陕会馆》为例来说，这里在明代是裕州(今方城县)兴隆店，也就是一个过路小店。在明代的河南地图上还无“赊旗店”。在清代的河南图幅上，才标出赊旗店。也就是从清代，赊旗镇才大大出名。赊旗店地处汉水交流的唐河上游，潘、赵二水环绕如带，由镇东北与西南流过，后二水合流，向南入唐河，唐河继续南流入湖北襄阳(今襄樊)，最终汇入汉水，直通汉口；而北经万城、平顶山，可直达洛阳、开封，于是清代的赊旗店逐渐成为一个四通八达的水陆要冲，为两湖、江西、福建、安徽、河南、河北、山西、陕西

九省通衢，也是北京通往云贵驿道的中间站，于是山陕等省商人纷纷到此建房设店，流寓定居，使赊旗舟楫车马，热闹非凡。粮食、棉花、食盐、布匹、煤炭、竹木、茶叶、桐油、生漆、药材、曲酒等各种物资汇集此镇贸易、储存、转运，形成一个物流枢纽。当时仅从事南北货物过往成交的过载行就有48家，故有“拉不完的赊旗店，填不满的北舞渡（位于赊旗镇东北的一个水运码头）”之说，赊旗店迅速发展为“北走汴路，南船北马，总集百货”的繁华巨镇。而在赊旗店最活跃、最有势力的商人就是山西商人。他们最早来到赊旗店从事茶叶、绸缎、刺绣、木材、食盐、布匹等商品的南北转运，其中茶叶为晋商经营的最大宗商品。请人袁干《茶市杂咏》载：“清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此处“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就是指由江西河口（今铅山县）运至河南赊旗店，再由此北运关外。山西茶商采买福建武夷山或湖南、湖北等地茶叶后，由水陆两路运抵汉口，由汉水至襄阳，转唐河北上达赊旗店，再改陆路，由马匹驮运北上过平顶山、洛阳，渡黄河，入山西，经晋城、长治、祁县，到太原、大同，再经张家口或归化（呼和浩特），用骆驼，穿越戈壁沙漠，运至库伦（乌兰巴托）、恰克图，与俄蒙商进行贸易。赊旗店正是这条“茶叶商路”上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随着经商活动的扩展，山西会馆的建立又大大拓展。不仅表现在大量建立新会馆上，而且更表现在会馆宏伟的建筑规模上。以往有一些关于评述晋商的文章中，晋商的形象是相当不佳的：刻薄、吝啬、不修边幅，举止木讷，最后归之为文化素养不高，不像徽商那样“贾而好儒”。甚至把清代山

西无一状元，也归罪在晋商身上，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厚道和忠诚本来是经商的一种美德，没什么不好，如果把他们的“学而优则商”归之为目光短浅的话，那么，也只有“学而优则仕”才是惟一正确的了？甚至于有人说晋商“在文化上不曾有过多少建树”就更是站不住脚的。且不说其它方面，仅从构筑宏伟、建造精美的山西会馆就不难看出晋商文化修养之高。

有人说，山西会馆在全国各地数量如此之多，规模如此之大，建造如此之美，靠的是雄厚的经济实力。

有人说，晋商的发达靠的是地理条件，山西干旱少雨，不宜农耕，但四通八达，南下北上，扼商路咽喉，适合经商。

有人说，山西人天生有经商才能，以“诚信”著称天下。

事实上，晋商能发达到如此地步，绝非以上一二因素所致。概括地讲，晋商的人文素质，除了显示在会馆建筑的宏大规模及精雕细镂外，主要的在于它承载着一整套系统的以人为本的商业理念。

在具体操作中，商人趋利而动的用心谋划和苦心经营，无一不折射出山西商人的聪明。做大、做强、做好，是商人一贯的追求，而这一追求的根底，端在做人，做名。有名则望，好的名望如同金字招牌乃天地之灵气，为万众仰目。

会馆名而有实，名副其实，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最终成就了财富的聚积，那就是生意越做越大，财路越走越宽，银两越挣越多。

依会馆而聚，依会馆而群，依会馆而谋，依会馆而兴。“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就是晋商及会馆辉

煌业绩的写照。

二、会馆的文化内涵与拓展

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是“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难怪当地流传着“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生子可作商，不羨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的民谚。这与我们熟知的中国封建传统“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相差何啻万里！

春秋战国时即以经商致富、后被尊为中国“商祖”的白圭，是三晋大地上涌现出来的巨商大贾。其经商取胜之道的核心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逆向思维，也可以说是“出奇”、“出险”之道。晋商的“学而优则贾”走的便是这条路。试想，当全国各地的聪俊子弟将聪明才智都用在读书做官，拼命想挤上科举功名的“独木桥”时，山西人却在源源不断地向商界选送文化素质高的优秀人才，潇洒从商，坦然为贾，一代又一代搏击于商海，用他们一流的脑瓜构想着商路的开拓、经营的改进、货物的运输和商业人才的培养选拔。他们有知识、有眼界、有对策，能以己之长，陷彼之短，能不异军突起吗？

寻找佐证，不妨到全国各地仅存完好的会馆游览一番，你会发现晋商在全国各地建立的上百座或更多的精雕细琢

的会馆,无论从数量和品位上看,风光占尽,都是一笔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虽然山西会馆大都已在上百年历史的风雨中坍塌、毁坏了,但遗留下来的依旧不少。这些遗址都在讲述着晋商在上几个世纪初一个又一个“学而优则贾”的发家的故事。

建筑是一种文化。晋商之所以能够在异地极尽奢华广建会馆,不仅与经商的需要,与他们所具备的雄厚经济实力有关。而且,与山西这一方水土所酿造的晋商文化在晋商内心根植深厚有关。

但凡成功的山西商人,赚了钱、发了家、致了富、不纳妾、不嫖妓、不花天酒地醉生梦死、而是把白花花的银子或用于修建豪宅,或用于阔建会馆,如此不动产均实实在在留在了此地无银银还在的土地上。这是由他们崇尚儒教,重视家规与家风长期熏陶的结果。

当然,山西商人在各地建筑的会馆,从选址、规划设计,直到施工的全过程,都是以主人的意愿决定的,所谓“三分匠师,七分主人”是也。比如,晋商在修建会馆时,总会情不自禁地在建筑物的木、石、砖上描绘和雕刻上精美的文化图案,且无一不是山西民俗喜庆、吉祥、多福、康乐、富贵、鸿运等企盼的直接体现。

晋商说起来是商人,其实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商人,而是力主“儒贾相同”、“义利圆融”的所谓“儒商”,故其所建会馆,不可能不凸显儒教文化的色彩。

历史上的康熙皇帝在位 61 年,文治武功、声名显赫,定三藩、统台湾、平西藏、战俄罗斯,殚精竭虑,勤于政事,开创